

志铭分撰：唐代墓志文学研究之新视角

赵小华

〔摘要〕 唐代墓志拥有史料性与文学性的双重属性，对唐代墓志的文学研究应该加强。从撰写者视角来研究唐代墓志，可以发现志文和铭文由不同作者分撰的特殊现象。从实际功用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铭之功用的看重；从文体分野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诗歌这种文体的高度认同。志铭分撰对于传世诗文别集中单独出现志文或铭文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也向我们揭示了唐代墓志发展的实际情形。

〔关键词〕 唐代墓志；志铭分撰；功用；文体

〔中图分类号〕 I206.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15) 03-0181-07

一、史料性与文学性：唐代墓志的双重属性

墓志作为一种出土文物，附带了许多信息，给学术研究带来极大冲击。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土的大量唐代墓志，为学术界带来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视野上的巨大改变。

从墓主身份来看，上至王公权贵、皇室公主、朝廷要臣，下至平民百姓、僧道妇女、山林隐者，无所不包；从社会礼仪来看，墓志是唐代葬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含了唐代各种礼仪制度的实施状况和变化轨迹；从写作手法来看，墓志的最初作用是记墓，既对死者有所怀念，又恐陵谷日久变迁、湮没无闻而将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家世、经历、交友镌刻于砖石之上，使后人能有所稽考……这些特征使得唐代墓志含有丰富的史料和文献价值，既可对存世文献进行校勘订误，又可补阙失的史实，为我们研究唐代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较为可信的第一手材料。

对于这一点，可以上推至宋代学者那里。如欧阳修对

唐《魏载墓志铭》的考证就是一例：

右《魏载墓志铭》，其序云“祖微，谥曰文正。父叔玉，光禄卿。载以弘文生对策高第，授太常寺奉礼郎，以疾谢职，寻调怀州司兵参军。属惟扬谗道，不戢斯焚，逮及宗姻，旋加此累。以垂拱三年终于岭外，春秋三十有二”。所谓“惟扬谗道”者，乃徐敬业起兵于扬州，诛武后不克也。时敬业以前盖屋尉魏思温为军师。所谓“逮及宗姻”者，疑敬业败，载坐思温死岭南耳。今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郑公诸房都无思温及载，而叔玉但著一子膺，为秘书丞。岂载以官卑贬死无后，而殁不见耶？载死不幸，而家谱不录，史官不书，非事载斯志，而志录于余，其遂泯灭于无闻乎。^{〔1〕}

这种路数在后来者赵明诚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赵明诚注重将墓志记载与史书记载相对校，并对史实进行考证，其《金石录》中既有利用唐代墓志考史证史、又有补史之阙的记载，对于墓志的史料性进行了充分利用。这在唐代墓志的当代研究中蔚为大观。

墓志写作有其固定的格式。陈尚君先生指出：“墓志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性别诗学：唐诗宋词研究的新视野”（10YJC751130）

〔作者简介〕 赵小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政治与行政学院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 510631。

首先要写出志主一生行迹,虽然墓志限于方石之内,但其内容又必须记录死者的家世、经历及后事,从而带有普遍的先天缺憾。就大多数墓志来说,叙事仅略存梗概,行文循通行的套路,其本身的文学价值是不高的。”^[2]然而,墓志作为唐代盛行的丧挽形式,以文字来记叙墓主生平事迹、表达后人追思,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必然具有文学性。从形式来看,墓志在发展定型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行文方式,表达某一类型的情感,逐渐成为众多文体中的一种;从内容来说,如何在有限的文字内融记叙、议论与抒情为一体,如何刻画人物形象、表达情感哀思,都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墓志发展到唐代,基本上定了型,成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很多墓志铭本身就是一篇感人的传记文学;墓志作品多且写得好的,有很多恰是文坛领袖,如张说、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还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墓志提供了不少文献方面的信息。因此,随着大量墓志的出土,学术研究在视野上要有所转变:既要继续墓志在史学方面的研究,发挥其提供文献、增补史实等方面的作用;又要加强其文学方面的研究,在作家、作品、写作风格和文体特征等方面有所挖掘,使唐代墓志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研究中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墓志的文学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如陈尚君教授强调墓志作为唐代丧挽文学研究的价值,指出墓志提供了古代传记文学研究的重要范本,以原生态面貌保存下来的墓志反映了唐代实际使用文体的具体状况,大量家族墓志展示了一个家族历代传承的过程,墓志提供女性文学研究的材料以及墓志对婚姻与家庭研究的意义。^[3]戴伟华教授指出:墓志是全唐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墓志和作者的留存,有助于人们认识唐代的文化特征和尚文的社会风貌;学界利用墓志可以考订诸多事项,如文学家生平、作家作品中的人名、一时风气和整体学术环境等;此外,墓志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文人所处时代的理解。^[4]胡可先教授对出土唐代文献材料(尤其是碑刻和墓志)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证,认为新出土文献为作家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发现散佚作品、参与唐代文学背景的理解,对唐代文学史研究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5]韩理洲教授也提到近代新出土的墓碑志给《全唐文》、《唐文拾遗》增补了5000余篇散文,可钩沉辑录佚文佚诗,用于校对古籍中抄录重印的志文时,可纠补文字的讹夺衍缺和倒置等错误。^[6]

总体来看,近年来唐代墓志相关的研究成果在以志证史、以志补阙或对相关墓志进行考辨的史学研究方面比较充分;对墓志的文学研究已得到学界重视,但还需进一步加强。如,对于把唐代墓志作为单独的文学研究对象来加以分析阐释的研究比较少;在已有的成果中,对韩愈墓志的研究是重点,其他作家则较少得到关注;从文体演进入手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对于唐代墓志写作的演变流程、其在墓志发展史中的地位及在传记文学方面的价值

等,都还有待学界加强研究。^[7]其中,墓志之写作者状况,直接提供了与志主相关的人事信息,涉及到作家作品留存数量、风格变迁、写作手法等重大问题,加之一直在墓志研究中受到忽视,尤其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二、志铭分撰:唐代墓志撰者的特殊现象

唐代墓志的文学研究,涉及到作家、作品、文献、人物、语言、风格、体裁等多方面视角。在现有的研究中,墓志内容、墓主身份和经历、文体辨别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然而,在墓志的撰写者方面则缺乏观照,少有研究在墓志作者方面着力。^[8]即便有对诸多文坛大家如张说、韩愈、柳宗元等人墓志的研究,也更多关注墓志内容、志主情况等,很少从作者之写作出发进行论述。因此,唐代墓志撰者的研究还有不少空白之处。其中,志铭分撰作为墓志撰者的特殊现象,理当得到关注。

墓志铭之起源,本是记载墓葬所在、表达悼念哀挽的一种文体,其形成与古代志墓的风气密切相关。由此,志主的子孙后代为先人树碑立传时,既要叙述志主之光辉事迹,以防陵谷变迁、湮没无闻;又要颂美先祖之宏才令德,以求流传久远、光耀来世。诚如曾巩所言:“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9]“义近于史”则志文记事,“有与史异”则铭文颂美。记事与颂美,两个目的是通过一篇墓志之不同部分而分别实现的。

从唐代出土墓志来看,为了文意贯通、文气顺畅,墓志铭虽然涉及到两种文体,大多还是由同一作者完成。然而,也有少数墓志是由两人分撰志文和铭文的。这种特殊的志铭分撰现象,既契合了志文和铭文分属不同文体、各有不同功用的特征,也向我们展示了唐代墓志发展的实际情况,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程章灿先生分析唐代墓志铭的结构与名目时就指出,墓志铭的志和铭两部分有相对的独立自足性:“有时候,如果一篇墓志需要由两个人合作撰成,一般的分工就是一个人撰志文(序?),另一个人作铭文。”^[10]在《陆广成墓志考》中他也指出:“此志体例有一特点,即墓志本文为丁仙芝撰,而墓志铭则为万楚所撰,志文与铭文分出两人之手,可以说是墓志中的一个罕见之例。”^[11]而志铭分撰现象在唐代的总体情形如何、为什么会出现等问题,还缺乏更深入的研究。

从能够明确辨析出志铭分撰的例子来看,唐代墓志文与铭分撰,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由姻亲家人分撰志铭,以求征信,并表达哀思。《刘潜墓志铭》云:“朝流故吏,共慕徽猷;嗣子家

臣,互通遗阙。外孙王进,长自渭阳,援翰如写,乃为铭曰……”^[12]《刘彦参墓志铭》,弟彦回撰序,侄日正铭:“天去手足,不知所之,痛穷孤以断肠,写蓄愤于方石。曾未万一,寄词于从祖兄子日正。”^[13]《刘君妻卢氏墓志铭》,志主表弟太子左庶子崔珪撰铭,男润撰序:“外丈左庶子清河崔公,国之栋梁,文之龟镜,仁风懿范,亲则周旋,敢说为铭,庶符先志。”^[14]《崔绛墓志铭》由李华叙志、卢沼作铭:“校书郎卢沼,于公则婚姻之故,咨以为铭。”^[15]《邢芳墓志铭》由其父邢恂撰序,文末云:“其姊婿河间刘琬述遂铭曰……”^[16]

有些志铭分撰作者与墓主虽非直接姻亲,但或为多年亲厚,或有特殊关系,由于与墓主感情深厚、多有了解,其所撰志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纳入求征信、表哀思类。如《李琬墓志铭》,前大理寺评事张阶序,洛阳县尉韩液铭:“予与公泉今洛阳尉韩液,皆同年擢桂之客,同舍校文之郎,是正多暇,周旋可数;而贞石购词,贵于详实,今予序之,韩铭之”^[17],分由两人完成,似乎更能达到“征其素行,庶不诬矣”的目的。《朱府君墓志铭》,秘书省正字宇文暹序,太子正字包何铭:“暹等平生旧友,把臂之交,情比巨卿,知同鲍子。徒凄凉于口焉,岂髣髴于清阳。顾不如于哀文,遂托词于包氏。”^[18]《张景阳墓志铭》,右武威卫曹参军张楚金序,大理评事马巽铭:“楚忝于宗盟,饱闻德义,雪涕挥翰,纪君实录。同人马巽为君之铭云……”^[19]皆为显例。

其二,托请富有文采者专门撰铭,以示纪念。如《唐故处士上官府君墓志铭并序》交代道,墓主儿子上官政的友人樊望之颇有文采,因此请其撰铭^[20];《周故承议郎行洛州永昌县丞清河崔君墓志铭并序》,志文末云:“友人给事中中山刘宪,言行动天,文章经国,惠此哀铭,情深操缞。”^[21]《虢庄王李凤墓志铭》志文中专门交代,铭文由博陵崔公撰写,因其才学兼俱、文笔优美。^①《贾季卿墓志文》由前乡贡进士李昂撰铭,前国子进士郑馥撰序,其文云:“馥与李昂□子之曩……特撰铭以铭德,谨勒序以序行。”^[22]《钱元志夫人舒氏墓志铭》,程休序、崔颢铭:“博陵崔颢,文章之特,託以为铭。”^[23]上述李昂、崔颢等人,皆为一时之名士。

其三,借重有名望者或富有文采者专门撰铭,以求不朽。这在志铭分撰的情形中占了绝大多数。有些墓主本人或亲属已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往往家人会借重更有名望者来抬高身份。《旧唐书·韦承庆传》称:“府中文翰,皆出于承庆,辞藻之美,擅于一时”“时欲草赦书,众议以为无如承庆者”,可见其声名之盛。韦承庆亲自撰写了父母的墓志铭《唐故纳言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墓志铭》、

《大周故纳言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夫人琅耶郡太君王氏墓志铭》之志文,而铭文则分别请当时的著名文人范履冰、李峤撰作。其父韦仁约墓志铭云范履冰“材冠士林,文高翰苑”,请他撰铭“庶尽言而无愧,俾传芳于不朽”^[24];其母王婉墓志铭云李峤“时秀朝英,文宗学府,胶庠朋故,枢近官联,敬託为铭,庶扬柔德”^[25],皆指出了托请盛名、以重身份的目的。韦承庆本人的墓志铭也是志铭分撰的好例子。其志文由岑羲所撰、铭文由郑愔所作。岑羲此时墓志署衔为“秘书少监兼修国史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国朝阳县开国子”;郑愔为中书舍人,“□簪学圃,藻绘词场。古之曹刘,当代迁固。”^[26]二人均身份显赫、影响极大。这种抬高志主身份、以期不朽的心态,在社会上层蔚为风尚。如《大唐故秘书少监刘府君墓志铭并序》云其志文粗陈实录,而“相王府司马弘文馆学士临淮刘祎之学府文宗,声高朝右,于孤子有累叶宗盟之好,敦死丧孔怀之情,敢祈鸿□,勒铭终古。”墓主身份本已显赫,铭文撰者刘祎之声高朝右,自然为之锦上添花。

其四,未明确交代分撰原因,仅从文题、文中或文末得知分撰信息。《唐故益州大都督府功曹参军张君墓志铭》于志题下仅署“司元大夫李行廉撰”,然志文中叙事屡以“束之”领起,乃是作者自称;志文末又云:“府君友人司元大夫李行廉撰铭,束之等不敢改易,谨刊李铭,以存不朽。”^[27]《尔朱公(杲)夫人韦氏墓志铭》云:“爱託苏子,乃为铭曰……”^[28]可知,来庭县尉成敬荷序,来庭县尉苏頌铭。《陆景献墓志铭》署礼部侍郎贺知章词,文中云“中书舍人彭城刘升与其友,故说铭焉。”^[29]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赘。

由于还有大量未知的墓志铭等待出土,由于现有资料的不完善,以上所论,虽非唐代墓志志铭分撰情形的全部,但也可管中窥豹,由此探讨该现象在唐代发展的具体表现。概括地看,可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时段上,由目前可见从总章二年(669)的《唐故处士上官府君墓志铭并序》,到大中元年(847)的《唐故东都留守检校尚书左仆射赠司空博陵崔云小女墓志铭并序》,唐代志铭分撰贯穿了从初唐到唐后期的近两百年,时间跨度不可谓不长;第二,从撰写者来看,志文和铭文的作者中,既有墓主家人,也有请托的名人;既有陈子昂、贺知章、苏頌、崔颢等名家,也有不知名者。这种志铭分撰为何会出现、时人对此的态度如何,都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对唐代墓志志铭分撰现象的分析

唐以前的志铭分撰大多零星出现,并没有形成一种引

① 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元0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411页。根据同年入空、编号为上元014的《阿史那贞忠墓志》署衔,知此崔公即崔行功。

人注目的现象。^①至唐代,墓志文体逐渐固定,其写作格式和手法皆已有章可循。诗歌发展高度繁荣,最终作为一种有时代代表性的文学体式登上高峰,在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留下烙印。唐代诗歌的发展对墓志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之一便是志铭分撰现象的大量出现。

与前代相比,唐代墓志志铭分撰数量众多、时间集中,带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对于唐人合作撰写墓志现象的出现原因,学界分析如下:其一,从写作者来看,如果志文的作者不足以胜任铭文的撰写,则需另请人作铭;其二,借重他人名望以抬高志主的身份;其三,防止谀墓情况的出现。^[30]上述三方面的分析主要从唐代墓志写作的社会文化背景入手,可谓宏观;但对于志文与铭文的不同地位、志铭分撰这一特殊现象与其时的文学发展及社会文化风貌状况阐发还嫌不够。下文便由此稍作申发。

(一)首先,从实际功用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铭之功用的看重。

一般认为,志文和铭文在文体上既有别,在功用上也殊不相同。从墓志铭的书写体例来看:“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序如此,如韩文《集贤校理石君墓志铭》是也;其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讳、曰字、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子,其序如此。”^[31]从众多墓志铭可见,王行此处所言“十三事”的记事叙述,一般通过志文来表现和完成。墓志铭中常见到“志之不尽,乃为铭曰”的表述,说明志和铭的互为补充,“志、铭往往要构成一个整体,才能完整地记载死者的生平事迹”。^[32]墓主的基本信息交代清楚之后,对其嘉言懿德的赞美,则需要通过铭文来表达:“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33]可见,对铭文颂美的功能,古人早已有清楚的认识。

以上所论,是符合唐人对墓志铭看法的。兹举一例以明。

中唐时期著名的古文学家李翱曾撰有《皇祖实录》记祖父李楚金事迹。其文以生动的语言状写先祖之交游、性格和行事,以细节刻画人物形象,以人物对话、动作、神态等传达精神,复以对比、反衬等手法反复摹写,突出

先祖之行状,文章语言生动、人物形象丰满、感情真实、可读性很强。但在文末,李翱却说:“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传,不仁也;翱欲传,惧文章不足以称颂道德,光耀来世,是以顿首欲假辞于执事者,亦惟不斥其愚而为之传焉。”由此转而请声誉更高的韩愈撰写墓志铭。韩愈《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下有注云:“习之尝自为其皇祖《实录》,其行治皆如《志》所书。”^[34]可见,就记事而言,李翱自撰的实录与韩愈所撰墓志实无区别。李翱自谦文章不足以称颂道德,自然有谦虚和夸张的成分;但正好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唐人更看重墓志铭称颂先祖、颂美德业的功能。

正因如此,主要承担颂美的铭文若能请托有声望、具美名的名家或大家来写,便更可以冀之传世了。这是造成志铭分撰出现的重要原因。在唐代墓志中,唐人也并不忌讳提及。如《秘书少监刘应道墓志铭》题名下未署书撰人姓名,志末总结说志文粗陈实录且百不书一,主要在于记事;而铭词另请托“学府文宗,声高朝右”的刘祎之撰写。刘祎之,“北门学士”之一,以文藻知名,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无论才华学识还是名声地位,都更加令人瞩目。^[35]再如前文所述韦承庆父母的墓志铭之铭文,分别请托当时的著名文人范履冰、李峤撰作。范履冰,“北门学士”之一,名重武周之时;李峤,和苏味道、崔融、杜审言合称“文章四友”,晚年更被尊为“文章宿老”,名重当时。不难看出,请托名家的主要原因是对铭文颂美功能的重视。

(二)从文体分野来看,志铭分撰凸显了时人对诗歌文体的高度认同。

作为志墓文体的一种,墓志铭之习称,包含了志文和铭文两部分;而志文和铭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文体辨析来看,墓志铭之志文和铭文,各具特点和功用。对此,前人早有明辨。通行的看法是:“志者,记也;铭者,名也……盖于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日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为异时陵谷变迁之防,而谓之志铭;其用意深远而于古意无害也。”^[36]由此可知,志文重在记事,其内容往往包括志主姓名、籍贯以及丧葬情况等基本信息,更多具备“文”的特点。“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谓可以信今传后,而润饰太过者,亦往往有之。”^[37]徐师曾所批评的“末流”,正是唐代墓志铭的实际情况

① 如南朝梁代《桂阳王(萧融)墓志铭》的志文之后、铭文之前有言:“梁故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桂阳王融谥简王墓志铭。□□长兼尚书吏部郎中臣任昉奉敕撰。”则该墓志的铭文为任昉所撰,特为标出。见毛远明校注《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3册,146页。《魏故使持节侍中司空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徐州刺史王公(诵)墓志铭》云:“弟衍,恋依形之方闕,悲嫌竹之难久,谨序遗行,寄之镌勒。抚军将军顿丘李奖,投分有素,藻贍当时,辄凭以为铭。”志铭分撰甚为清晰。见洛阳市文物局编《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137页。类似的例子并不多见。

况：假手名士、多方润饰以为铭，其最终目的在于颂美而传后。从文体来看，铭文多为四言韵文，对古代铭辞和《诗经》体式可谓一以袭之，更多具备“诗”的特点。这是志文和铭文在表达内容和语言形式上的巨大区别。

从唐代出土墓志的写作实际来看，由于唐人对诗歌文体的重视，墓志的写作形式也有诸多革新。这突出体现在铭文的写作上。

唐前的墓志铭文，多为四言韵文，几无例外。伴随着墓志在唐代的发展、成熟乃至定型，铭文的写作不再拘囿于四言，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举凡诗歌中出现过的三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乃至楚辞体等句法纷纷涌现，摆脱了传统铭文的僵硬板滞。下面以著名文人贺知章为例，简要分析。贺知章是唐代知名文人，但流传下来的文章甚少，《全唐文》中仅有遗文两篇。要进一步推进贺知章研究，陈尚君先生认为：“真正具有文学研究价值的是近代以来出土的贺知章撰文的唐代墓志，达8篇之多，内容极为丰富。”^{〔38〕}随着考古的发现，目前所知贺知章撰墓志铭已达10方^①，对于研究贺知章及其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帮助。在这10方墓志中，有9篇的铭为贺知章所撰，而《大唐故大理正陆君墓志铭》之铭辞为“中书舍人彭城刘升”撰。贺知章所撰铭辞，大多数为传统的四言体，庄重严谨，符合墓志铭的文体功用特征。如《唐故光禄少卿上柱国虢县开国子姚君墓志铭并序》之铭，为四言体，多达十一首，从家世、官职、道德、经历、家庭等方面反复赞颂墓主。然而，也可以见到贺知章铭辞写作在传统之外的新变。如《唐故朝议大夫给事中上柱国戴府君墓志铭并序》铭文：“橘州浮兮昭潭无底，沙如雪兮泉味犹醴。楚人秀兮地灵所启，旌弓招兮载笔灵陞，饷馈给兮含香建礼。彼君子兮如王之毗，人之云亡潜焉出涕。彼达人兮何必故乡，树粉檉兮封兹北邙。篆幽石兮志夫阴堂，岁遒尽兮烟墅微茫。”^{〔39〕}从墓志整体风貌来看，对于熟读离骚的楚地亡人的悼念，楚辞体确是不二选择；从铭文文体来看，近乎楚辞的韵味哀婉多致、饱含怅惘，在对铭文语言形式革新的同时细致入微地表达了感情，铭文的“诗性”得到进一步强调和突出。

更有甚者，铭文取志文而代之，将传统的志主姓名、世系、丧葬年月等信息都用韵文写就，一并融入到铭文之中。见于《唐代墓志汇编》、后被陈尚君先生收入《全唐诗补编》的《王氏殇女（容）墓铭》则为一例。该墓志标题便直接点明文体性质，其铭云：“王氏殇女其名容，

名由仪范三德充，诵诗阅史慕古风。卑盈乐善正养蒙，是宜百祥期无穷，奈何美疾剿其躬。芳年奄谢午咸通，季夏二十三遭凶，翌月十八即幽宫。寿逾及笄三而终，晋阳之冑冠诸宗，厥考长仁命不融。外族清河武城东，中外辉焯为世雄，今已矣夫石窆封。仲父刻铭藏户中，以舒临穴梗悲恫，古往今来万化同。高高谁为问圆穹，姑安是兮龟筮从，谥吉良兮从乃公。”陈尚君径直将其作为诗歌收入《全唐诗补编》，并说：“此方墓志无序，铭文通篇为七言韵文，与诗无异。在唐志中颇罕见，故录出之。”^{〔40〕}“墓志无序”，在出土文献中殊为少见；其序中应有信息，都在铭中得以反映，体现了唐人对铭文的创新和改革。而铭文“与诗无异”，则折射出唐人对诗歌一体之格外重视。

是以，在有些墓志中，唐人往往请托诗名盛者单独作铭，以示区别。如韦承庆墓志铭，分别由秘书少监兼修国史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国朝阳县开国子岑羲撰序、中书舍人郑愔制铭。“□簪学圃，藻绘词场。古之曹刘，当代迁固”^{〔41〕}的评价，强调了郑愔的辞藻之学；刘潜墓志铭曰：“外孙王进，长自渭阳，援翰如写，乃为铭曰……”^{〔42〕}突出王进的文翰之词；钱元志夫人舒氏墓志铭，由左威卫尉曹参军广平程休撰序、许州扶沟县尉博陵崔颢撰铭：“博陵崔颢，文章之特，诤以为铭。”^{〔43〕}看重崔颢文章之特。^②

是以，铭文“与诗无异”的特征，在志铭分撰的铭辞写作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和集中。

如《大唐颍川郡夫人三原县令卢全善故夫人陈氏墓志铭并序》志文撰者不详，其铭文则特为标出：“荣泽主簿博陵崔藏曜，外姻近族，富学精才，郡县官联，往来情洽，诤为铭志，式播芳猷。”其词曰：“妣汭颍川兮洪流肇源，积庆储祉兮钟兹后昆。恭修六义兮谦以光尊，内备四德兮淑慎且温。伯父夺志兮禀命割恩，克荷中馈兮表正二门。柔规素范兮爱惠长存，处壻翼子兮如兰如荪。降年不永兮有识含冤，崇邱之上兮开穴归魂。风飒飒兮晓霜繁，车逶迤兮旒飞翻。生涯兮斯极，天道兮宁论！”在句式上夹杂八言、六言、四言，间以楚辞体的“兮”字，句式变化多端，语气深幽哀婉。左领军卫兵曹参军薛纂撰志文、刘升撰铭的《唐故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任城县开国男息彭城刘府君墓铭并序》之铭辞云：“嗟嗟兮刘生，穆穆兮时英，清神忽谢兮何杳冥？高坟崛起兮空峥嵘。不知松贾兮何年成？又不知丘垄兮何年乎？吾匪识千古之亏盈，但睹昊穹之青青。”以四言领起，间“兮”字以显变化；七言继之，连续三个问句增强了对墓主年少而逝的惋

① 笔者目力所见，所补充的两则墓志铭为：《唐故光禄少卿上柱国虢县开国子姚君墓志铭并序》、《大唐故司空襄公夫人郃国夫人王氏（内则）墓志》。前者见毛阳光：《洛阳新出土贺知章撰〈姚彝墓志〉考释》，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4期；后者见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 崔颢，知名文士，两唐书有传，《新唐书·艺文志》载《崔颢诗》一卷。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可知，崔颢“文章之特”，乃在其诗歌创作。

惜之情；最后以六言统收全文，每句以“之”字拉长语气，营造了一唱三叹、哀伤不已的气氛。《唐故居士钱府君夫人舒氏墓志铭并序》，“墓志之撰序者程休与撰铭者崔颢，两位名重当时的文学之士合作一篇墓志，在洛阳、偃师出土墓志中十分罕见”。^[44]崔颢是其时知名文士，尤以诗歌见重。其铭辞云：“光光受氏兮始国于舒，绵绵瓜瓞兮载迁厥居；高门积庆兮盛德钟美，诞生淑灵兮克配君子。斤斤在堂兮黄发无忒，义方教子兮名振王国；天不慙遗兮降此鞠凶，门虽必大兮无及万钟。地一闭兮永夜，以日易兮长高丘之荒松。”前半部分句式整齐，表面上看来只是用“兮”连接了两个四字句，但实际的效果是语意绵长、音韵铿锵，诗的韵味十足；最后一句极尽变化，五言后紧接一长句，以荒松高长写日月相易，相当生动，简洁的措辞中令人回味无穷。

四、唐代墓志志铭分撰现象研究的意义

如前所言，为了文气的顺畅和文脉的贯通，唐代墓志大多由一个作者独力完成；但由于志文和铭文是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各具特色、各有其用，也有少数由两人分撰志文和铭文的墓志出现。对于这种现象，一些金石目录学著作和诗文别集已经有所揭示。前者如《金石录》卷三所载《隋上仪同杨绪墓志》下云：“许善心撰序，虞世基铭。”^[45]后者如《韩昌黎文集》中《试大理评事胡君墓铭》一文，只有寥寥十二个字：“友韩愈，司马徒；作后铭，系序初。”姚范注曰：“此谓作后铭系于初序之后，则先已有志，亦志铭分为之矣。”^[46]后者对于其他诗文别集中单独出现志文或铭文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如《岑嘉州诗集》卷四所收《唐博陵郡安喜县令岑府君墓铭》云：“泾水汤汤，汉陵苍苍。木箫箫兮草自黄，门一闭兮夜何长。”本卷还有《果毅张先集墓铭》一首，亦只有铭文：“茂陵南头，渭水东流。山原万秋，兄弟一丘。白杨脩脩，只令人愁。”^[47]刘开扬先生认为此二首铭文

“见于明正德济南刊本。疑原有墓志，已佚，下同。仍从原本称铭。”^[48]佚佚当然是一种解释。不过，认为两篇文章皆是佚失了志文，其说服力似乎还不够。根据上述韩愈集现象，另一种可能的情形是：这两篇墓志的创作者是两人，其中岑参只创作了铭文，因此其别集中只录铭文，所录标题也为“某某墓铭”。他如张说集中的《凤阁尹舍人墓铭》《子曲阿令墓铭》等，也可类似看待。

此外，志铭分撰现象还向我们揭示了唐代墓志发展的实际情形。现有存世的书面文献，往往历经时间沙汰，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后人篡改、字句脱落、版本变异等情形，其传播和接受过程的复杂性增强了文献面貌和使用的不确定因素。而墓志一经撰写后便沉埋地下、原貌保存，在被发现出土后便以原生态的样式呈现其在唐代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一类的文章没有经过后代的选择，以原生态的面貌大量发现并保存下来的，它让我们做唐代的文体研究，可以看到唐代实际使用文体的具体状况，逐年都可以看到这种风气的变化。这是和我们一般根据存世的文献研究很不同的一个思路。”^[49]

唐代墓志的志铭分撰现象提醒我们注意，在墓志实际发展轨迹中曾经出现过的、相对于常规的变异现象和相对于多数的少数现象。这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关注出土文献为文学研究带来的新材料，另一方面也要应对出土文献带来的新发现和新挑战，从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来开展文学研究。如，对于墓志撰写者的研究、对志文和铭文的文体辨析，既是研究志铭分撰现象所需要采用的直接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此前漠视墓志作者、混淆志铭文体的现象。对铭文诗性的关注，与唐代诗歌发展密不可分。而通过与唐代其他文体如碑志文、祠观记、廊庙碑、器物铭、颂赞文等的对照，发现志铭分撰广泛存在于应用类文体中^①，也会启发我们从功用角度将多类文体联系起来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唐代墓志的不断出土，志铭分撰现象还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唐代文学研究也将有更加丰富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 [M]. 李逸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204.
- [2] 陈尚君.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 [C] // 逢甲大学中文系编. 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2004: 711.
- [3] [49] 陈尚君. 石刻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 [J]. 华夏文化论坛, 2013 (1).
- [4] 戴伟华. 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 [J]. 文学遗产, 1998 (4).

① 如张说集中，就有许多题为“某某碑铭”或“某某墓铭”的文章。根据明嘉靖刊本《张说之集》，很多文章的创作情形都可以分明。《昭容上官氏碑铭》标题下注：“齐公叙不录”；《故太子少傅苏公碑铭》标题下注：“卢藏用撰序不录”；《故吏部侍郎元公碑铭》标题下注：“崔湜撰序。”则三篇墓碑文皆为志铭分撰：碑铭均为张说所撰，而碑文（序）分别由齐氏、卢藏用和崔湜撰写。其他文体的志铭分撰，详见孟国栋《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第二章“新出石刻与唐文合撰现象研究”，浙江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71-73页。

- [5] 胡可先. 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 [J]. 文学遗产, 2005 (1).
- [6] 韩理洲. 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3).
- [7] 刘城. 国内近十五年来唐代墓志之文学研究综述 [J].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7 (3).
- [8] 吴夏平. 从作者看唐代墓碑文的文体不变 [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2).
- [9] [33] 曾巩. 寄欧阳舍人书 [M] // 曾巩集: 卷一六.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53, 253.
- [10] 程章灿. 墓志铭的结构与名目——以唐代墓志铭为例 [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7 (6).
- [11] 程章灿. 陆广成墓志考 [J]. 考古, 1995 (10).
- [12] [16] [17] [18] [19] [20] [27] [39] [42] 周绍良, 赵超主编. 唐代墓志汇编 [G].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366, 2238-2239, 1620, 1709, 1527, 507, 822, 1157, 1366.
- [13] [14] [15] [29] 赵文成, 赵君平编. 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464, 591, 677, 510.
- [21] 赵振华. 洛阳新出唐代墓志研究三题 [M] // 中国文物研究所编. 出土文献研究: 第八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71-272.
- [22] 西安碑林博物馆编. 贾季卿墓志 [M] //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 380.
- [23] [43] [44] 周剑曙, 赵振华, 王竹林. 偃师新出土唐代墓志跋五题 [M] // 洛阳历史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河洛文化论丛: 第三辑.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 314, 314, 315.
- [24] [25] 吴钢主编. 全唐文补遗: 第二辑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5: 8, 10.
- [26] [41] 陈忠凯. 唐韦承庆及继母王婉两方墓志铭文释读 [M] // 中国文物研究所编. 出土文献研究: 第七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345, 345.
- [28] 吴钢主编. 全唐文补遗: 第七辑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9: 24.
- [30] 孟国栋. 新出石刻与唐文合撰现象研究 [D] // 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 杭州: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2012: 75-78.
- [31] 王行. 墓铭举例 [M] // 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 第1482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81.
- [32] 吴承学, 刘湘兰. 碑志类文体 [J]. 古典文学知识, 2009 (3).
- [34] 韩愈. 韩昌黎文集校注: 卷七 [M]. 马其昶, 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550.
- [35] 刘昫, 等. 刘祜之传 [M] // 旧唐书: 卷八七.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36] [37] 徐师曾. 文体明辨序说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148, 148.
- [38] 陈尚君. 贺知章的文学世界 [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3).
- [40] 陈尚君辑校. 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 卷三一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1152.
- [45] 金文明. 金石录校证: 卷三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7.
- [46] 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 卷六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381.
- [47] 廖立. 岑嘉州诗笺注: 卷四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706.
- [48] 刘开杨. 岑参诗集编年笺注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5: 827.

(责任编辑: 潘纯琳)